Journal of Modern Literature in Chinese 現代中文文學學報

Volume 13
Issue 1 *Vol. 13.1-2 十三卷一、二期 (Summer 2016)*

Article 3

5-1-2016

前言 = Foreword

Kuo Wei CHEN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Yan, Vivien WEI
Lingnan University, Hong Kong, vivienwei@ln.edu.hk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commons.ln.edu.hk/jmlc

Recommended Citation

陳國偉、魏艷 (2016)。前言 = Foreword。《現代中文文學學報》，13(1-2)，64-67。

This Foreword/Introduction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 Centre for Humanities Research 人文學科研究中心 at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in Journal of Modern Literature in Chinese 現代中文文學學報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前言 **Foreword**

陳國偉 CHEN Kuo-wei

國立中興大學台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究所

Graduate Institute of Taiwan Literature and Transnational Studies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魏艷 WEI Yan

嶺南大學中文系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ngnan University

在近兩個世紀中，亞洲與西方不論在文學或文化層面，均有著超乎以往複雜且多元的交流，而在各種跨國、跨語際的翻譯與傳播現象中，大眾文學與文化（popular literature／culture）可以說是最能表現出此間互動的複雜性。不論是從科學主義出發最終賦予高度人文主義關懷的「推理／偵探／犯罪」（mystery／detective／crime），透過架空世界摹想當下與未來現實的「科／奇幻」（SF／fantasy），或是東西方冷戰架構下異軍突起的「間諜」（spy），抑或是反映現代人集體潛意識的「恐怖」（horror）、「驚悚」（thriller）「懸疑」（suspense），無一不是十九世紀開始在西方誕生茁壯，隨著現代性的跨國散佈，透過不同的途徑與介面，傳播到東亞各國。

的確，如今我們所習見的大眾文學類型，與中文文學世界的現代性方案息息相關，就像王德威在《被壓抑的現代性：晚清小說新論》所提到的，中國科學小說與科幻小說的萌芽，得力於新式科學帶來對現代文明的想像。不約而同地在海峽的彼岸，台灣知識份子也透過漢文與日文兩種管道，接受了不同的譯本典範而進行偵探小說創作，延續著當時殖民母國日本對於犯罪科學的重視，嘗試將指紋、顱相學等鑑識科學的新興技術納入，呼應著帝國的政治治理與權力支配。就連在古典文學

裡原本就有的愛情小說傳統，在西方羅曼史（romance）及日本純愛小說的浸染下，也注入了自由戀愛、主體、獨立、婚姻等現代情境中才擁有的新思考。

當然在西方，大眾文學的發達，往往取決於社會中商業體制的成熟運作，但在戰後東亞各政治體制的劇烈變化，與其後隨之而來的冷戰局勢中，卻又各自演化出與西方截然不同的生產場域與模式，並開啟對國家、社會、歷史，甚至是文化理論不同的對話與回應。

其中，一九五、六〇年代被視作是香港文化和身份的形成期，更是港式大眾文學與文化興起的重要階段。「國家不幸詩家幸」，一九四九年的政治劇變使得一些作家與出版社南遷至香港，為香港文學注入新的活力。大量難民的南湧更是為香港文學帶來了大量及多元化的讀者群。同時，香港作為資本主義大都市的商業運作環境，以及英殖民者對左右敏感政治意識形態類作品的查禁，均促成了大眾小說市場的蓬勃。就地域流通上來看，一九四九年後，大陸推行社會主義革命文學，原有的鴛鴦蝴蝶派及西方的翻譯文學或被視作封建落後的文學，或被劃為資產階級思想的腐蝕，紛紛被禁止，舊有的鴛鴦蝴蝶派出版社，如羅斌所領導的環球出版社南下，香港成為了中國一九三〇、四〇年代大眾文學的繼承者。此時國民黨統治下的台灣，在 「反共復國」口號下，也警惕大眾小說對人心的腐蝕。在此種種機遇下，竟造成了香港成為了華語大眾文學生產及流通的樞紐。

資料的散落及難尋是研究此時大眾文化的主要困難。這些當時是三毫子的小說如今紛紛洛陽紙貴，為不同的收藏家所有。秉著對香港文學的熱愛，新加坡國立大學的容世誠教授特意捐出他的藏品，在這批寶貴的材料基礎上，2014 年在香港嶺南大學人文中心組織並陸續召開了「一九五〇年代的香港文學與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亂世桃花逐水流：一九四〇年與五〇年代香港廉紙小說的生產與流通」國際學術研討會。本次專輯中四篇與香港有關的論文便得益於這兩次會議的討論。

已故學者梁秉鈞教授曾精闢的指出，「香港文化中的弔詭之處，則正是雅俗未必是對立的；雅俗文化之間有較複雜的關係：如本質上是商業化的電影事業中也有優秀而充滿創意的作品；本身以出版流行雜誌《西點》、《藍皮書》和三毫子小

說為主的環球出版社，也同時是出版現代主義文藝雜誌《文藝新潮》的出版社！」[1] 雅俗未必對立首先體現在嚴肅的作家為了生存，往往不得不以化名的方式創作大眾文學。劉以鬯著名的小說《酒徒》中就表現了這類作家的精神分裂。是此專輯中李婉薇的論文〈論五、六〇年代香港右傾文人的生存空間 —— 以黃思騁的文學活動為例〉即是討論此類嚴肅作家創作大眾小說的議題。李婉薇以黃思騁（1919-1984）為例探討了此類嚴肅作家在創作「三毫子小說」小說時有意對一些言情小說的固定程式加以改寫，故事中並沒有常見的大團圓結局，而其中的女性也都命運多舛，其中不乏一些嚴肅的人性反思，提升了大眾小說的人文色彩。

其次，雅俗的融合還體現在報紙副刊裡作品的選擇上，由於大眾小說連載則是吸引讀者，提高報紙銷量的重要手段（如金庸、梁羽生的武俠小說最早就在左派報紙《新晚報》副刊上連載），因此往往報紙的副刊裡會出現嚴肅與大眾文學並存的局面。此次，須文蔚與顏訥著重研究了一九五〇年代的右派報紙《香港時報》的副刊裡連載的大眾小說。以往對於《香港時報》的研究，主要側重於劉以鬯主編的《香港時報 · 淺水灣》的副刊版面上的嚴肅文學，實際上，根據須文蔚、顏訥的統計，實際《香港時報》副刊的作品，仍是以通俗作品為主，值得研究者的重視。須文蔚、顏訥的論文對一九五〇年代刊登在《香港時報》副刊的通俗作品的類型、作者背景及之後的成書出版狀況做出了仔細的整理與清晰說明，特別是文後的小說篇目整理更是為日後的進一步研究提供了豐富資料。

一九五〇年代香港大眾文學與一九四〇年代的上海鴛鴦蝴蝶派傳統關係密切，出版社與讀者均出現了一定的重合。是次魏艷的論文〈女俠形象的流變 —— 以「女飛賊黃鶯」與「女黑俠木蘭花」及其影視改編為例談一九四〇到一九六〇年代間偵探通俗文學從上海到香港發展的一些變化〉即是從這個角度談雙城之間的大眾文學的承繼關係。論文通過黃鶯故事在不同時代與不同地區發展的流變，分析此類小說為何會在一九五〇、六〇年代香港流行，又是如何在進一步的影視改編中逐步本土

1 也斯：〈「改編」的文化身份：以五〇年代香港文學為例〉，黃淑嫻、宋子江、沈海燕、鄭政恆編：《也斯的五〇年代》（香港：中華書局，2013），頁 101-102。

化的過程。

而在台灣，一九五〇、六〇年代進入了國家文藝政策主導的時代，在純文學界因為現代主義思潮，產生了大量的詩與小說作品。但在此同時，卻也有以大眾小說為媒介的創作者，創造出另一個迥然不同的書寫空間，陳國偉的〈越境出走：費蒙一九五〇年代年代犯罪／間諜小說中的香港〉一文，探討了台灣民眾所熟悉的漫畫家牛哥，如何以（李）費蒙為名，發表了一系列以香港為故事舞台的犯罪小說與間諜小說。其分析了台灣當時嚴峻的政治情勢，對於類型小說所需要的現代都會空間與冷戰角力想像，造成了如何的限制，而香港所具有的國際政經位置，成為了台灣創作者取徑／越境出走的樞紐，進而能夠連結世界，來取代被反共文學禁錮的超現實幻想中國。

而這或許正是台灣大眾文學所具有的特殊政治性，從上承襲日治時期對帝國秩序的演繹與重寫，往下開啟對殖民論述的重省與解構。林芳玫教授是當代大眾小說研究的先驅，她的代表作《解讀瓊瑤愛情王國》至今仍然是言情小說研究的經典之作。此次她的論文〈性別化東方主義：女性沙漠羅曼史的重層東方想像〉從女性沙漠羅曼史這一言情小說的次類型出發，透過梳理大量東西方的相關作品，試圖對薩伊德的東方主義提出修正，探討理論中被忽略的性別意涵，並發現台灣此類書寫中東方想像的重層性與曖昧性，雖然沒有真正的超越東方主義，但也經由再生產的過程，將其顛覆與轉化為女性自我成長的契機。

不論是從香港或台灣各自的脈絡，抑或是透過雙方互動張力所浮現的協商與再生產機制，大眾文學在這百年來的中文文學世界中，的確展現出多元併陳的繁複生態，並透過重層的跨國、跨區域傳播，激盪出多樣態的文化翻譯與在地生產動能，提供與當前各式新興論述結合的學術潛力。本次專輯諸篇論文，其實只是為此深具開創性與前瞻性的領域，拋磚引玉，希望能夠在這些研究基礎上，開發更多的文本與論題，為中文文學中的大眾文學研究，開啟更多的可能。※